



# 高教信息参考

2020年第10期（总第310期）

西北师范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2020年4月23日

## 目 录

### 教育资讯

- 教育部将在部分重点领域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库..... 1
- 首批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面向全球免费开放..... 1

### 高教视点

- 学位点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2
- 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六点启示..... 6

### 大学论坛

- 张江：用科学精神引领新文科建设..... 8

### 高校动态

- 安徽大学科教融合筑基一流学科建设..... 14

## 教育部将在部分重点领域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库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决定启动部分领域教学资源建设工作。通知明确，聚焦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开展教学资源建设，完成专家组织组建、知识图谱构建、教学资源建设、资源审核应用、资源持续更新、教师培训等工作，推进“四新”（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推动高等教育“质量革命”。

通知提出，从2020年起，分年度在部分重点领域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库，优化教育教学条件、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探索“四新”理念下教学资源建设新路径和人才培养新模式。

通知强调，资源建设要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研究确定重点建设领域，明确建设任务，加快相关领域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将资源建设与资源使用相统筹，实现在资源建设中培养教师队伍，在资源使用中锻炼教师队伍。同时，建立科学的建设领域动态调整机制和资源的持续更新机制，提高资源服务支撑能力。资源建设同时面向高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并注意最新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完善经费和机制保障，对通过审核的资源建设者，给予适当资助，并在教育信息化等相关项目中给予优先支持。

（《中国教育报》2020年4月21日 作者：黄鹏举）

## 首批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面向全球免费开放

学堂在线英文版国际平台于4月20日上线，首批上线课程109门，后续的课程引进与上线工作将持续推进。这标志着以学堂在线等为代表的首批高等学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面向全球正式推出。

学堂在线国际版定位于汇聚国内外一流在线课程，首先支持中文、英语，后续将陆续支持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及日语等语种。平台支持慕课、直播、证书、在线学位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将重点挖掘来自中国高校的一流课程，同时兼顾引进全球性区域性顶尖高校的一流课程。学堂在线国

际版将与学堂在线雨课堂英文版无缝连接，国际版课程经授权后可供雨课堂海外师生应用于混合式教学。

据介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日前召开中国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课程建设工作视频会议，推出首批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爱课程”和“学堂在线”，并成立国际平台与课程建设委员会和专家顾问组，支持平台上线运行。平台将上线一批代表中国质量、具备世界水准的优质课程，旨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对外展示、交流与应用的平台，推动中国高质量高等教育教学资源的全球共享。

（《中国教育报》2020年4月21日 作者：万玉凤）

## 学位点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关于下达2019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各大高校或单位共撤销193个学位点，新增231个学位点。

博士点、硕士点数量和规模，是衡量高校学术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一直是高校自我宣传时的重中之重。从2016年首次实行动态调整以来，全国各招生单位累计撤销学位点1598个，新增学位点999个。

学位点的增加和撤销，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这样的调整，出于什么考量？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其背后到底是谁和谁的博弈？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 学科基础先天不足，忽视内涵建设，高校主动申请撤销

靴子终于落地——吉林大学教育技术学出现在这次撤销名单中。

“去年年底，学校就传出了风声。”吉林大学教师宁凯（化名）对该学位点被撤销并不意外，“近几年根本招不到学生，大部分学生都是调剂过来的。”

吉林大学高教所官网专业介绍显示，目前，该学位点仅有3位教师和6名学生，且连续多年发布招生调剂信息。和其他被撤销的学位点一样，在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后，该专业将停止招生。

记者梳理发现，这次撤销学位点最多的学科仍为软件工程和应用化学，各有6个单位撤销。四年间，共有74个软件工科学位点被撤销，年年位居撤销榜前列。

记者调查发现，学位点被撤销，无外乎是来自“外部压力”或者“主动选择”。

2016年，教育部发布了首次专项评估结果，其中“不合格”“限期整改”等学位点合计186个，它们因“表现欠佳”被强制撤销。

更多的是高校或单位结合办学定位，根据对学位点的质量审核，自主撤销、动态调整学位点。这次，陕西师范大学的科学技术史、农业经济管理均在此列。

据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祁占勇介绍：“科学技术史学位点申请时，由时任校领导牵头并担任学科带头人，几年前这位校领导和两位骨干教师先后退休，学位点勉强支撑了几年后，难以为继，直到被撤销。而农林经济管理面临同样的情况。”在他看来，“导致学位点撤销因素多样，但核心就是教师梯队建设没有跟上”。

浙江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楼世洲给出的学位点被撤销的“症结所在”，是报考人数和招生数量过少，就业前景不好，很难与其他学科形成学科群，导致学科缺乏竞争力。

“在本世纪初，特别是开始布局学位点时，许多高校认为学位点多多益善，有的专业东拼西凑进行申报，实现了学位点数量上的增长。但是，这些学位点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先天不足，获批之后又忽视内涵建设。”按照祁占勇的分析，学位点动态调整，解决此前高校快速发展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高校学科建设逐渐回归理性的表现，即更加注重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 **教师与学校展开“拉锯战”，只为保留学位点**

国家一直鼓励高校动态调整学位点，裁撤需求不足、水平不高的学科，增列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学科。面对国家政策，各大高校纷纷主动“瘦身”。但是，在优化学科发展的背后，还另有玄机。

不管是即将开展的“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还是第五轮学科评估，学科都被视作重要的评价单元。在不少学校眼中，这是决定今后资源分配的重要标准。

“有很多因素都导致学位点被撤销，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学科评估排名靠后，会影响学校的综合排名。”楼世洲直言，“在与学校综合排名产生矛盾的时候，有关学位点的去留，决定权通常在学校。”

在此背景下，学位点调整更像是一次“战略调整”。与此类似，这几年不少高校中相对弱势的学科，逐渐被“关停并转”。一些新兴学科不断出现。

尽管学校处于学位点调整的主导层面。然而，在调整过程中，由于缺乏评价和实施机制，新问题不断凸显。

去年底，在一所东部知名高校的全校会议上，校长表示计划撤销5个学位点。最后，只撤销了2个博士学位点，其它3个文学类硕士点被暂时保留了下来。

撤销的原因无非是学位点前景暗淡，然而，被保留下来的学位点也不意味被看好。

该校教师张华（化名）透露，消息一出，拟调整学位点的教师，特别是资历较老的教授，就与学校展开“拉锯战”，“有的教授直接抱着一大堆学术成果跑到校长办公室，和校领导去据理力争，用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保留所在学位点”。

学位点保留下来最直接的好处是，给学科留下发展的根据地，也好留住年轻教师，相关学术研究还能继续下去。

一位在拟裁撤名单里的学科的负责人担忧：“如果，在我手里这个学位点被撤销，几代学人的心血就付诸东流，香火就断了。”

同样的焦虑也波及到张华所在专业。“我们这个文科专业在学校发展的大盘子上，既没有优势，也没有基础。”张华估计，不出几年，所在专业逃不过被撤销的命运。“学位点调整，依然掺杂着复杂的因素。不是说撤就撤，说建就建。”

## 学科评估加剧调整步伐，调整规范化、透明度依然欠缺

在沟通、酝酿，甚至是发生摩擦拉扯之后，学位点得以撤销，但并不意味着问题随之消失。

当送走最后一届毕业生，教师的去留将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作为年轻学者，张华已经“悄悄地”为自己准备后路，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向学校的相关主流学科靠拢。他告诉记者：“主流学科的带头人已经动员我了几次，希望能够转投他们麾下。”这样一来，等到学科评估时，张华的几个核心成果，就会被算作主流学科的成绩。

北京大学副教授沈文钦分析，学科评估要求每个教师只能隶属于某一个学位点，为了增强某一学位点的实力，高校可能会牺牲弱小学位点，要求这些教师归并到其他学科点接受评估。

学科评估正在加剧学位点调整的步伐，但不是所有教师都如张华般幸运。

一些教师也许会被分流到学校相关专业中，但是接受的学位点很可能会考虑这些老师的专业知识背景，还需要考虑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科研产出等诸多因素。宁凯说：“重新确定研究方向或者调离学校，可能是这些教师们的最后选择。”

“对于一所高校来说，不应该人为划分为主次学科，而应该论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衡量学科的标准应该是看学科的师资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对学校乃至社会的贡献度”。在宁凯看来，目前，动态调整决策未能形成一套科学规范、广泛参与的机制，“一线教师没有参与，缺乏话语权”。

学位点撤销事关重大，涉及教师、在读学生、校友、家长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应该包含更广泛的论证和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如同行评议、内部评估、校友与利益相关者论证会、协商申诉机制等。沈文钦建议：“未来应该进一步推进学位点调整工作的程序规范化、方法科学化和过程透明化。”

（《光明日报》2020年4月21日 作者：陈鹏）

## 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六点启示

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教育和科技的大规模结合来实现全体学生居家学习。

教育创新与科技创新也在助力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增长点，线上力量正在兑换为线下力量，为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和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提供深度变革的内生力量。

### 优质在线教育资源显现集约化发展趋势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我们看到，由优质师资集中打造和承载的“视频录播”资源和形式，为教育端和受教育端所共同偏好。中肯来看，在线教育由于对软硬件设备、资源聚集、教师素质等方面的高位要求，相对难以形成学校和教师各自为战的个体化成功实践。同时，最好的课程却能以最低成本、最大规模、最高效率进行扩散和传播，这意味着优质在线教育资源开发和开放，有着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集约化趋势。技术发展给教育领域引发的集约化、中心化、统一化趋势，将给不同地区间教育公平与均衡的推进以及跨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甚至内地-港澳/大陆-台湾等）的教育融合发展，带来非同一般的时代契机。但这种集约化的线上趋势如何与“线下教学”所承载的多样化、个性化、情境化取得平衡——线上集约、两线分化、各取所长，均有待关注和探索。

### 年轻师资是推进在线教育的重要支撑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我们看到，任教年限越短的教师，其在线教育相关指标表现越好。也就是说，教龄越短，在线教育所需技能的掌握程度越好、在线教育过程中师生互动情况越好、在线教学实际效果的满意度也越高。年轻师资在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实验中显现了巨大潜力，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未来在线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

### 在线教育“特殊学习节律”有待深度探索与把握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我们看到，在线教育中互动的维系、注意力的维系至关重要。提炼兴趣、内化感官体验，将知识传授轻量化、热点化、娱

乐化以有效吸引和保持学生的注意力，是在线教育有效开展的关键。此次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对象群体，基本上属于“互联网原住民”——生来就置身于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群体。信息传播媒介的改变、知识承载平台的改变，本身就在形塑和制约着在线教育的特殊节律。从宏观上看，互联网经济本身是一个“注意力引夺经济”，也启示我们在线教育有着自身的、独特的存在逻辑与发展规律，有待深度探索与把握。

### **东、中、西不同地域间在线教育指标差异不可回避**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我们看到，此次西部地区在线教育在几乎所有数据指标上都落在后面。西部教师本身的在线教育技能掌握程度较差，而其感到的最大挑战是“学生家庭环境和条件带来的干扰与障碍”，最希望获得的支持也是“学生家庭在线学习条件的支持与保障”，西部学生每天在线学习的时间也显著短于中、东部地区的学生。经由在线教育而凸显出的“数字鸿沟”不可回避，加强对弱势地区、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与集中保障势在必行。

### **中国互联网的普及性和先进性是在线教育的重要铺垫**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我们看到，此次教育抗疫事实上更凸显了中国互联网技术的领先性和普及性，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教育和科技的大规模结合来实现全体学生居家学习。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主要方式中，教育系统以外的普通民用互联网通讯平台是迅速贯彻和保障“停课不停学”的中坚力量，教师、学生与家长的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也是在中国互联网的普及性和先进性大背景下所形塑的。进一步，教育创新与科技创新也在助力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增长点，线上力量正在兑换为线下力量，为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和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驱动教育-科技双向赋能、智造未来的大趋势，提供深度变革的内生力量。

### **全民共识是迅速深入贯彻在线教育的核心关键**

中国此次疫情期间在线教育有着成功的动员和舆论铺垫，并一度成为全民的舆论热点。据课题组另外收集的教育舆情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全网



资讯中有关“在线教育”信息的情感属性中，正面和中性表述共计占比为96.61%。教育战线“用屏幕照亮前程，用技术跨越障碍”的适时行动与有效部署，为教育战线从“战时向平时”的过渡积累了卓越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光明日报》2020年4月21日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 张江：用科学精神引领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建设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引起教育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都在关心这一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它关系到人文社科自身的发展创新，关系到人文社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文社科如何适应日益深化的社会变革，如何服务日新月异的时代需求。

归根结底，新文科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学科自身，更在于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科建设不是一般性、补丁式、表面化的创新，而是学科定位、专业布局、评价体系的全面创新。

全面创新当然是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有一个突破点。这样一个突破点，要能够从根本上创新人文社科的学科特征，还要能够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笔者认为，这个创新点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我们知道，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知识分化的结果。学科的形成既与知识的分类密切相关，也与知识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密切相关。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理念、方法、目标和流程。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它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重新分割了这个世界，重新构成了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说，世界因学科而断裂。

比如，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意思是说，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分家”的意思不仅是“不要分家”，而且是“不

能分家”。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从科学研究来看，文史哲不仅分了家，而且隔膜越来越明显。

又比如，我们经常讲，诗乐舞在起源上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诗乐舞相互之间的壁垒越来越严重。

再比如，对文本的阐释问题，或者说阐释学的问题，它是有关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属于基础学科，甚至应该说属于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阐释学以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涉及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等问题，反映出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我们可以说阐释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其本身就是“反学科分化”的一个结果。

这当然不是要否认学科分化的意义。事实上，没有学科分化，就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现代文明，我们也就不可能在这里坐而论道，探讨学科交叉融合的意义。

笔者所要强调的只不过是，学科分化让我们掌握了更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的种种显微镜，让我们拥有了更轻松地看到远方世界的种种望远镜，但是，这些显微镜或者望远镜很可能是有色眼镜，它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也同时向我们遮蔽了这个世界。

就这个意义而言，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实际上就是要突破学科分化的这个有色眼镜，尽可能地面对世界本身，面对事物本身，回到问题本身。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新文科建设，是人文和科技的融合问题。

60年前，英国学者斯诺在演讲中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双方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校教育太过专门化。

斯诺的演讲尽管论证粗疏，也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本身却是非常关键。而且，60年后的今天，人文与科技之间，仍旧是壁垒森严。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也深有感触。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专家，其中有些专家被老百姓戏称为“砖家”。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也和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化有关系，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脱节有关系，体现在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脱离社会现实，视野、格局和方法上都严重受制于所在学科的规定性，受制于这种规定性带来的种种局限性。

因此，自然科学研究如果不融合一些人文精神，或者不在人文精神之光的照耀下发展，它的意义和方向就可能出问题；同样地，人文科学研究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如果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它的结论和价值也必然缺乏坚实的根基。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两个维度，它的均衡发展尤其重要，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最高的层次上是同源的、统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着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人文科学则着重于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整个学术史其实既是一个学科不断分化、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学科不断交叉、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融互渗。

现代社会，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日益加大，界限日益清晰；从内在关系上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人文科学的引导，人文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就是要逐步打破学科之间的既有界限，以交融互渗、协同共享为途径，对传统学科进行改造、转型和升级，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路径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模式创新。简而言之，交叉融合是发展趋势、是创新路径，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需要。

那么，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应当从自然科学中吸取什么？笔者认为重点有二，一是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二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

首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到人文研究，科学精神就是立足客观事实，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务实；按照基本逻辑规则梳理思想，表达见解。

坦言之，人文研究缺乏科学精神的问题相当普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阐释文本的意义，应该从文本出发，依据文本，有理性，有逻辑。不从文本找根据，不讲基本的逻辑关系，那阐释的还是这个文本吗？阐释还有什么理性可言？有什么价值可言？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讲文学阐释的开放性，这没有问题。

但是，只讲开放，不讲约束，只讲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讲一千个哈姆雷特仍然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堂吉诃德，也不可能变成玛格丽特，这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对文本的阐释是一个不断从文本出发，又不断回到文本，不断放飞意义，又不断从文本中寻找意义起降点的过程。不讲根据，不讲逻辑，阐释从何而来，阐释的价值又如何实现？

研究阐释，就要研究阐释的规则，研究阐释学的基本概念。概念混乱，阐释学作为一个学科还能有什么意义？最基本的，到底是“阐释学”“诠释学”，还是“释义学”“解释学”？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不同的阐释路线，关系到中西阐释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大家可以有争议，可以相互保留意见，但不能说这个问题不重要。

再比如，文学作品意义的开放性问题，一直以来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安伯托·艾柯写了一本《开放的作品》，于是许多人就跟着喊作品是开放的，把阐释的开放当成了作品的开放。可是，阐释具有开放性就一定意味着作品具有开放性吗？阐释具有无限性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的蕴含具有无限性吗？作品和对作品的阐释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着眼于作品的自在规定性，后者着眼于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规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在规定性否定关系规定性，但也不能因为关系规定性而否认自在规定性。

毋庸讳言的是，很多关于文本阐释的讨论中，存在着基本概念混乱、概念的内涵游移不定，甚至是偷换概念的问题。包括艾柯自己，在丹纳讲

坛上，主张作品开放性的艾柯，当别人任意阐释他的文本时，他就不同意了，说自己的文本没有那么多意思，没有别人说的那些意思云云。

缺乏科学精神，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缺乏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进步的精神。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文研究就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古人，重复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说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话。动辄某某古人说什么，某某洋人说什么，就是没有我自己说什么。

这当然和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有关系——人文科学的很多问题、基本性的问题，都是已经讨论了两千五百年还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能是拾人牙慧，只能是“嚼别人嚼过的馍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脱离古人的历史语境，脱离洋人的现实情境，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把古人或洋人的片言只语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普遍真理，当作不可逾越的雷池。其实这都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表现，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是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表现。

比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曾经宣告形而上学的系统哲学的终结，宣告分析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但他也同样坦陈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我们的文艺理论、我们人文学科不去关注罗蒂思想的发展变化，不去研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和得出结论的方式，而是固守于罗蒂几十年前的观念，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归根结底，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追求思想进步的科学精神。

与科学精神相关联，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价值追求，但是它的价值追求从来不能脱离人的存在的客观性；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人文学科有自己的边界，但这种边界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的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文学科的发展一直就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近代实验科学的崛起，转变了人们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认知，也转变了人文学科

研究演进的路径，可证实性和逻辑性进入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这极大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

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人文学科一味固守于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自我追问和思辨，无视人存在的客观性，通过开放的边界保持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其功能的发挥和价值的展现得不到自然科学的有力支撑，就很可能自我封闭并从而走向自我循环的死胡同。

笔者在研究阐释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时，便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准确地说是引入了数学中  $\pi$  和正态分布的概念，用前者来描述阐释的有限和无限问题，用后者来描述阐释的公共性问题。

从路线上，阐释可以分为“诠”和“阐”。

其一，“诠”的最终追索，是文本的自在意义及作者的本来意图，它的展开和实现，如同于  $\pi$ ，无限且连续，各点位之间相互依存，以至互证，共同诠释  $\pi$  的无限意义。对“诠”而言，约束，有限，是为追求，但同样具有无限空间。

其二，对“阐”而言，开放，无限，是为本征。“阐”是无限的，但无限的“阐”是真的能够永远无限下去吗？“阐”的有效和无效有没有一个可资判定的框架或标准？事实上，一般阐释结果的分布形态，就是概率分布。

面对确定的哈姆雷特，100 万人的理解和阐释离散多元、不可预测。但是，众多的阐释结果，其分布将是标准的正态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曲线的描述。此分布规律，用于阐释学分析，其横轴为现象或文本呈现，其中线为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本意义的期望或可能接受结果，全部独立阐释的结果分布于曲线面积之内。相比西方同类理论，正态分布是呈现和说明阐释无限与有限关系的最好方法与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与对自然现象的正态分布描述不同，阐释作为精神现象，其公共期望与方差很难定量，但是随着大数据的引入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普及，这种借助数学模型对精神现象的描述，其意义或可进一步期待。

这是笔者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一种尝试，成败自有评说，但这种尝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要用科学精神来促进人文研究，引领新文科建设。因为，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而言，自然科学的具体成果固然重要，然科学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立场、信仰、思想方法才是关键。（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学术网 2020 年 4 月 19 日 作者：张江）

**主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深度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安徽大学科教融合筑基一流学科建设**

近年来，安徽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争一流、重服务、创特色”为原则，以打造世界一流学科为重点，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主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度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推动科教融合、协同创新，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

**建立科学研究“大平台”**

2017 年 9 月，“双一流”建设学校和学科名单公布，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入选。借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东风，聚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安大成立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该研究院在校内整合 8 所理工科学院科研资源，校外与科研院所、企业合作，旨在交叉、创新、合作过程中打造一个科研“高峰平台”。这是安大推进科教融合，助推学科内涵发展的一次新尝试。

要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仅靠单个学科、单个平台难以支撑，要找到学科群坚实发展的动力。为此，安徽大学整合资源，按照一流牵引、主干强身、交叉驱动的思路，分层建设一流学科“大平台”。

**一是科教融合，建立学科“交叉平台”。**瞄准国家战略、学科前沿重大科技问题，积极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科院等国家级科研平台无缝对接，学校先后搭建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与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一起形成四大学科交叉平台。

**二是聚焦重点，建立学科“创新平台”。**为夯实一流学科基础，学校又相继建设了“集成电路先进材料与技术产教融合研究院”“多源大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农业生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等一大批新兴高水平交叉学科平台，新增“功能杂化材料结构与性能调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信息材料与智能感知”安徽省实验室，为学科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深入拓展，搭建学科“国际平台”。**围绕解决重大问题、攻克重要技术等问题，学校实施“111 计划”学科引智基地建设，建立国际联合实验室，强化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国际组织合作，组织协同开展科研攻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 4 所孔子学院、9 个中国中心，2 个平台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

瞄准“卡脖子”关键技术，安徽大学在功能材料设计与精准合成制备、量子材料微观结构与电子态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研究突破。安大重点培育的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科群建设成效显著，形成徽州文化、徽州社会史、新安理学及皖派学术史等特色优势。正式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量最多的古本。同时，安大积极构建国际徽学研究交流机制，通过举办首个全国性徽学学术研讨会、召开全球首届徽学学术大会，推动徽学拓展成全球共享之学。

### **培育协同创新“新引擎”**

由安徽大学科研人员牵头研发的光电感测科技成果，以 5022 万元作价入股创办科技企业，创下了省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安大探索校企协同创新模式的一个实例。



为探索灵活多样的校企、校校、校地等协同创新模式，安徽大学建立了涵盖文化遗产、区域发展、行业产业等各类型协同创新中心，并引导各中心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一是校地合作，贡献科学发展“新智慧”。**围绕新农村建设，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宿州市政府等单位，安大成立“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宿州市成功试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由国家六部委向全国推广；围绕依法治省，与省委政法委共建法治研究院，参与起草 50 余项法律法规规章。

**二是校校合作，带动省属高校“新发展”。**安徽大学通过与省属高校结对帮扶以及培养导师、支撑平台建设、牵头建立创新联盟等方式，带动提升省属高校整体水平。

**三是校企合作，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围绕安徽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安大与 400 多家制造业相关企业紧密合作，聚焦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为合肥打造中国“白色家电之都”、建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特别是世界制造业大会永久落户安徽作出重要贡献。

安徽大学已与省内 16 个市签订了多层次的校市合作协议，与 50 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 600 多家企业保持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学校在先进功能材料、信息技术研发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创新成果，如研发激光测量与光纤传感特种装备、攻克水性聚氨酯材料工艺难关、创新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设计新方法等，为创新发展培育了“新引擎”。

### **构建协同育人“立交桥”**

“发表 SCI 学术论文 40 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20 篇（包含 JCR 一区 16 篇，二区 4 篇），总影响因子超过 180，文章总被引超过 700 次……”这是安徽大学有机化学专业联合培养研究生康熙在硕、博期间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在康熙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优异的科研成果，得益于安大“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自2010年以来，安大共建设7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融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及其教育科研区资源，联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院所，通过选聘高层次人才、共享大科学装置、参与重点重大项目，开展联合培养，累计招生491人。

除搭建与高水平科研院所的合作平台外，依托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安大不断拓展育人空间，探索开环教育体系，构建协同育人“立交桥”。

**一是瞄准重点行业领域，培养研究型创新人才。**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大院大所和科大讯飞、长鑫存储等科技企业共建“集成电路先进材料”“集成电路器件”等5个英才班，实施科研训练计划和海外交流计划，培养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是瞄准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培养紧缺人才。**围绕两个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创业教育）、三基并重（知识、能力、素质）、三段培养（通识、学科基础、专业教育）、多种类型的“233N”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安徽大学与合肥市政府共建互联网学院，培养“互联网+”战略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

**三是瞄准学术研究前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以“开放联动、共赢发展”的理念创新中外合作办学体制，布局建设海外办学基地。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合作，建立“安徽大学纽约石溪学院”。实施“第二校园学习计划”，瞄准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和国际一流本科生教育优质资源，至今已组织400余人次学生赴境内外著名大学学习。

**四是瞄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才兼备人才。**安大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培养人才的全过程，现形成“新思想进思政课创新行动”“问题导入、专题拓展”教学法等系列改革创新成果，着力做优思政课程，打造了“文典大讲堂”“磬苑对话”等系列有影响力的课程思政讲堂。围绕网络育人目标，学校承建全国首家省级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中心，统筹和服务全省123所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不断拔高思政育人标杆。

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学校坚持引才与育才并重，以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优秀人才计划”为抓手，构建一流学科“人才库”。一是加速汇聚高端“人才库”。抢抓编制周转池试点机遇，建设院士工作站，采取“大师+团队”“双聘”“特聘”“预聘”等形式，加速高端人才汇聚。二是积极培育卓越“人才库”。为加快教师能力提升，通过开展“金课”建设培训班、网络培训，构建团队“传、帮、带”机制，积极遴选支持多名骨干教师面向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提高教师产学研合作深度和人才培养能力。三是加大教师考评改革。2017年，安大成功入选教育部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建立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从制度上鼓励教师专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积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

“合肥科学岛的大科学装置国际领先，如今已向安大开放，科学岛的研究员有一部分在安大教学，这样一来科研和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安徽大学校长匡光力表示。

（《中国教育报》2020年4月20日 作者：朱雪融）

**发送范围：**校领导（纸质版），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电子版）

---

西北师范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967号

邮政编码：730070

网 址：<http://ghc.nwnu.edu.cn/>

电子邮箱：sbgj@nwnu.edu.cn

传 真：(0931) 7971509

办公地点：行政1号楼218室、220室

联系电话：张克勇 (0931)7971588 曾庆平 7971285 张向东 杨霞宏 7971509

---